

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 经济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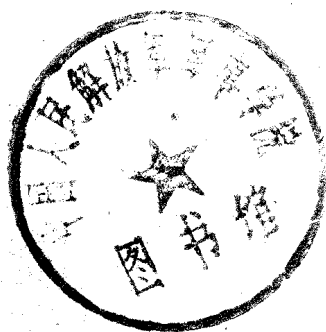
于光远 著



2 019 7294 5

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 经济效果

于光远著



人民出版社

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经济效果

于光远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5.25印张 100,000字
1978年10月第1版 197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80,000

书号 4001·344 定价 0.33 元

前 言

讲求经济效果，在各项工作中力求用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同样的效果，对于加快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在每种物质资料的生产中和每一经济工作部门中(严格说来应该说“在一切和物质生产有关和消耗物质资料的部门和单位中”)，都力求讲求经济效果，而且在计划工作、综合平衡方面都能够从谋求最大经济效果的角度处理得当，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做到多快好省。这个道理，本来是很明显的，也可以说是一个社会常识。但是，由于我们国家在解放以前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文化科学水平低，没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那种讲求效率的风气和习惯。解放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在各项工作中要讲求经济效果的思想，在经济工作和宣传工作中没有能够足够重视，因此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对经济效果的评价工作只有少数设计部门进行，而且这种计算往往因为没有掌握到必要数据和在理论与方法上也缺少研究而很不精确；几乎所有企业甚至很大的企业，都没有专门配备从讲求经济效果的角度研究和监督生产工作的人员，即经济工程师的制度(少数单位已设立的，也没

有能发挥他们应起的作用),专门以经济效果为对象的研究机构数量很少,工作也做得很少。在高等学校中,一般都很少开设讲授经济效果问题的课程,更很少设置有培养这方面专门人材的专业。我们的国民教育当中和社会教育当中也没有认真地进行这种讲求经济效果的教育。总之,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在我们的各项工作中,对讲求经济效果这一点,一直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特别是到了六十年代初,曾出现了一种只要算政治帐不要算经济帐的错误思潮,而且这种错误思潮在一个时期内传播得相当广,在我们的经济工作者中以至一些经济学研究工作者的头脑中引起了某种混乱。针对这种情况,我国经济学界开始重视对经济效果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在一九五九年,我曾经写过两篇关于讲求经济效果的文章,其中一篇就是收入在这本书里的《经济效果和产品质量》。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党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一九六三年,我国经济学界为了执行这一方针,曾经提出并对经济效果、经济核算和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等三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当时的刊物发表了许多篇这方面的文章。同时在制定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全国科学技术十年规划的工作中,把技术经济的研究即对于技术措施、技术方案、技术政策进行经济效果评价的研究工作也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地位。在那个十年科学规划的纲要中,把研究课题共分为六大部分:第一,关于资源科学技术问题的研究;第二,关于工业科学技术问题的研究;第三,关于农业科学技术问题的研究;第四,关于医药卫生科学技术问题的研究;第五,关于技

术经济问题的研究；第六，关于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学、生物学等基础学科的研究。这就是说，在这个规划纲要中，把对技术经济问题的研究和资源、工、农、医、基础学科等并列作为其中的一个大部分。这是给以很高重视的。在一九六三年经济学界关于经济效果问题的讨论和制订全国科学技术规划的过程中，我感到有必要写一部系统论述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质资料生产经济效果理论的书，和写一部关于如何计算经济效果的数学方法的书，并且花了一些时间进行这两方面的工作。在一九六三年内，两本书各写出了几十万字的草稿。后来因为别的事情忙，没有能接着写下去完成全稿。一九六六年，我失去了这些稿件，这个工作当然只好完全放弃。这些书稿除了第一本书的前两篇，因为一九六三年曾经印过稿本，在一九七二年找到一份外，其它手稿至今再也找不回来了。在一九六三年，我还发表了两篇关于加强农业技术经济研究的文章和一篇《舍象了产品的特殊形态后的投资效果的概念和它的计算方法》，后一篇是在研究计算经济效果的数学方法过程中写的，发表在中国科学院出版的《科学通报》上。

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我国的国民经济受到“四人帮”一伙严重的破坏和摧残，那时候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要把被他们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夺回来，使我国国民经济不至于崩溃。那时谁还有心思要讨论经济效果的问题呢？我自己也就把这个问题丢在一边。自从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之后，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又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经济工

作得到了很快的恢复和发展。现在全国广大的干部和群众，正在各条战线上为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强国努力工作。为了实现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提高运用客观经济规律的自觉性，讲求经济效益、改进经济管理就成了我国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带关键性的问题。在一九七八年六、七月份召开的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华主席、李副主席、余秋里副总理和许多到会的代表，都强调了讲求经济效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华主席在讲话中指示：“我们必须在全党，在全体经济工作人员中，在财贸工作人员中，大张旗鼓地进行加强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益、增加企业利润、厉行财政监督的教育，这样就能大大地促进生产，并且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更多的资金。”李副主席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经济部门要向所属企业检查经济效益，财政金融部门也要研究有效措施，积极配合经济部门对各企业经济效益的检查和监督。使用国家的投资，当然不许可浪费、挪用、贪污盗窃，但是如果使用以后经济效益很差甚至发生亏欠，这就是对国家投资的更大浪费。只要不是由于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那么，就必须让这样的企业承担一定的财政责任，使它们和其他一切企业都引以为戒。”余秋里副总理在大会的报告中也指出：“资金的使用，必须讲求经济效益。”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这些指示，把讲求经济效益的问题提到很重要的地位。它必将进一步改进我国的经济管理工作，提高管理水平，大大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

在一九七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七八年年初制订一九七八

年——一九八五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当中，对技术经济的研究，即对技术方案的经济效果的研究又再一次提到了重要的地位，它和关于生产管理现代化的研究合在一起，被规定为科学技术研究的重点项目之一。为了实现这个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规定的这个任务，经济学界与有关部门的同志正在进行制定关于开展技术经济研究八年规划的工作。这个方面的研究工作也开始重新建立，如有些部门的研究机构已经着手建立，有关的研究会也正在酝酿成立。对技术措施、技术方案、技术政策进行经济效果评价和论证的活动又开始重视起来。

形势改变了，条件改变了。为了宣传讲求经济效果的必要性，使比较多的人们懂得重视经济效果的重要，为了使在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和各项工作中的职工懂得如何讲求经济效果，迫切需要经济工作者在研究的基础上，写出各种关于经济效果的著作。为了满足当前的需要，我希望热心这方面工作的同志进行这种研究，尽快写出这方面的书来。而且我也知道有些同志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写这样的书并不难，但是为了比较充分地反映我国当前状况，适合工农业各部门的特殊需要，就要求把问题研究的比较细。这样看来，短时期内还不一定能出书。不少关心经济效果问题研究的同志，劝我把以前写的这些东西先印出来给他们参考。于是，我就把还能找得到的以前写的关于经济效果的文章和文稿拿出来翻了一下，觉得十多年前写的东西，其中不少内容对于现在的情况来说，还是有些用处。我想了想觉得那样做可能有点好处。

这样就产生了这个集子。

在这个集子里收入了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三年发表的四篇文章和幸存的那个残稿。一九五九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关于讲求经济效果的文章和一九六三年发表的另一篇加强农业技术经济研究的文章，因为内容与别的文章有重复，所以没有再编入。

在《经济效果和质量》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当中和在社会主义生产当中，经济效果的概念是不一样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而资本家借以达到这个目的手段是在生产中预先付出一定数量的资本。因此，资本主义生产中所说的经济效果，就不能不是资本家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对他预付资本的比例关系。生产同样多的剩余价值，预付资本小，从资本家看来经济效果就大。预付资本大，经济效果就小。反过来也是一样。用同样大小的预付资本，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大，经济效果就大，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小，经济效果就小。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最大的经济效果，就是用最小的预付资本，取得最多的剩余价值。这是资本主义生产中经济效果的概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的目的，是生产使用价值来满足社会的需要，而社会主义社会借以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就是从事劳动。因此，社会主义生产中，所说的经济效果，就不能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所获得的使用价值对社会在生产中所消耗劳动的比例关系。生产同样多的使用价值，消耗的劳动少，经济效果就大，消耗的劳动多，经济效果就小。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用同

样的劳动消耗，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多，经济效果就大，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少，经济效果就小。在社会主义生产中，最大的经济效果，就是用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多的使用价值。这是社会主义生产中经济效果的概念。”这是我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效果这个概念企图给以科学说明的一个尝试。就我所知，在这以前，似乎别人还没有这样说过。

但是关于这个问题，这篇文章中有一点讲得不充分。这就是，资本家为了用最小的资本取得同样多的利润，也十分重视用最少的劳动取得同样多的使用价值。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讲得很多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是资本家取得最高利润率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个事实使有的同志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效果同样是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同样多的使用价值。我认为在两个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经济效果的概念还是应该加以区别的，因为在这里有一个什么从属于什么的问题。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使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所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满足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是为了达到生产剩余价值、生产利润的目的。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虽然也十分重视用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同样多的使用价值，但是这是从属于用同样多的资本取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取得尽可能多的利润这个根本目的的。因为有这样一种什么从属于什么的问题，所以当减少劳动消耗取得同样多的使用价值有利于追求最大利润这个根本目的时，资本家就会竭力去减少劳动的消耗，但是如果不是那样，就会发生资本家不惜消耗更多的劳

动来生产同样多的产品，来达到其获得最多的剩余价值最多的利润的目的。这种情况列宁在帝国主义论里论述帝国主义的腐朽性时作过说明。当然这不是一般的情况，但是原则上理论上不但不能排斥这种情况，而且应该把这种情况考虑在内。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目的是要求生产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用最少劳动的消耗取得同样多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经济效果本身。

当然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劳动者是和社会公共所有生产资料的结合中进行生产的。在生产中不但要消耗活劳动而且要消耗包含在生产资料中的物化劳动。在经济效果概念中的劳动消耗应该是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总和。同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一个从劳动占有角度来考察的经济效果问题，即在消耗同样多的劳动（包含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取得同样多的使用价值，可以有的占用物化劳动多，有的占用物化劳动少。占用多的从经济效果角度来看就不如占用少的。这样的问题比较复杂一些。关于这样的问题，在《经济效果与产品质量》这篇文章中我没有涉及，而在我后来写的《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质资料生产中的经济效果问题》时写进去了。在后面这个书稿中，我说明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效果的基本概念即使把劳动占用问题考虑进去仍旧是劳动消耗对使用价值的关系，而从劳动占用和劳动消耗两种不同角度来考察的经济效果的统一是要从全社会的经济效果来考察才能解决。

在上面这段话中，我虽然讲了生产同样多的使用价值消耗的劳动少经济效果就大，反之就小这样的话（这样说是准确

的),但是接着又说“在社会主义生产中,最大的经济效果,就是用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多的使用价值。”后面这句话是我沿用过去习惯用的说法。但是严格说来,不是那么科学的。所谓经济效果大或者经济效果小是一个比较的观念。要比较就要有一个比较的共同的尺度。在赛跑中的两个人要有同一的起点和终点,这样才能分出谁是优胜者。所以,要有一个同样多的使用价值或者同样多的劳动消耗才能比较两种不同情况下经济效果的大小,一个最少,一个最多,反而不好比较。我在后来写的《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质资料生产中的经济效果问题》文稿中,就明确地抛弃了这样一个说法。改用较大的经济效果就是用较小的劳动消耗取得同样的效果,或者换句话说,用同样的劳动消耗取得较大的效果。

《经济效果和产品质量》这篇文章和《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质资料生产中的经济效果问题》的第一篇,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效果的概念除了上面两点论述外,还从其它方面作了探讨。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要对经济效果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就有必要对经济效果这个概念认真地仔细地科学地分析。在《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质资料生产中的经济效果问题》这个稿子中,对经济效果的概念除了重新讲了《经济效果和产品质量》上面讲过的那些思想外,我还对使用价值量、产品量、劳动消耗量、劳动占用量等概念问题和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经济效果等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论述。

在那个稿子里,讨论物质资料的生产中经济效果的概念时,曾把它具体化为:对获得一定数量的使用价值而进行的实

践活动所作出的劳动消耗或者劳动占用大小的评价。在这个概念中包括两个因素，一个是使用价值量，一个是劳动消耗或劳动占用。

大家都知道使用价值有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物的效用的不同性质决定使用价值质的不同。不同质的使用价值不能比较，这是明显的，因此在谈到经济效果的概念时，对使用价值的质不可能发生相互比较的问题，它不会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什么困难。困难的是使用价值量。在那个稿子中，我企图对这个困难进行一些考察。我认为在研究社会主义物质资料生产中的经济效果时，要比较不完全相同的产品的使用价值量的大小，就必须首先把使用价值的概念，特别是使用价值量的概念搞清楚。物的效用的性质相同时，数量相同但属于种类不同而具有某种相同性质效用的物，或者种类相同但数量不同的物，所起的效用往往有量的差异，即存在着使用价值量的差异。这种物的使用价值量的差异，可以从时间、空间等方面来表现，而使用价值量的差异，大多数表现在强度方面。但在具体研究时，会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因为一物的使用价值往往是多方面的，对同时是各种使用价值的量很难找到合适的尺度。

但是在比较同样产品时，可以把这个问题简化为比较各自的产品量，因为这样可以同时比较它们各方面的使用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价值量就可以具体化为产品量了。所以在研究经济效果时，对生产相互可以代替的产品，应该用使用价值量的概念，对于相同的产品，就可以用产品量的概念。

在经济效果的概念中我把取得的效果来和劳动消耗或劳动占用进行比较。劳动消耗和劳动占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劳动消耗量是生产某个使用价值时实际支出的劳动量，它包括活劳动的消耗和物化劳动的消耗。而劳动占用量，则是指这个使用价值生产期间占用的物化劳动量。考察生产某个产品所消耗的劳动量时，我们可以不必去问这个产品的生产经历了多长时间。但考察产品的占用劳动量时，一定还要考察时间因素，因为对于同样是同样多的劳动，比较长时间的占用和比较短时间的占用是不一样的。甚至即使是进行同样的生产，但在不同的时间（例如用新机器生产时与用已经提出许多折旧后的旧机器生产时），所占用的劳动量是不同的。因此，在那个稿子中，我从劳动消耗和劳动占用的大小来说明经济效果的概念。从劳动占用来考察的经济效果和从劳动消耗来考察的经济效果两者是有区别的。有区别就有矛盾，我注意到了这个矛盾。

在稿子的第一篇中，我对如何把这两个概念统一起来，作了一些努力。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的物质资料生产的效果问题，就是这样提出来的。在这个稿子中我还指出，生产某种产品的社会经济效果，就是全社会对某种产品个别经济效果的平均。它是以考察这种产品的个别经济效果作为基础的。考察全社会生产某种产品的经济效果，其目的是考察社会生产这种产品的水平，对这种产品的经济效果进行历史的比较。同时，如果把某个生产单位生产的某种产品的经济效果与整个社会生产同样产品的经济效果进行比较，就可以看

出个别生产单位的经济效果水平同社会平均水平的差异。

在这些概念中我把从劳动占用来考察的经济效果和从劳动消耗来考察的经济效果统一了起来。我认为这样算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在那篇稿子中，似乎应该再展开一点讲会更好些。

在《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质资料生产中的经济效果问题》第二篇中，就各种经济效果指标的概念和如何计算作了论述。这是因为，研究和讨论经济效果问题，除了一般概念外，定量的计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计算出经济效果的大小，对某种生产的实践活动或者计划方案就不能作出评价。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对于上面讲的生产某个产品的经济效果，特别是从全社会考察的经济效果，是不能确切计算的。我们只能从一个方面，一个局部范围，或者是全面地、综合地然而只在一定程度上近似地来计算经济效果的大小，这样就产生了我们常说的许多经济效果指标或称经济指标。它可以分成：各种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消耗的指标以及决定各种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消耗指标的指标；各种劳动占用指标以及决定各种劳动占用指标；或者同时反映从劳动消耗和劳动占用角度来考察的经济效果指标。经济效果指标是多方面的，所以有时从不同的经济效果指标考察生产某种产品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实践活动的经济效果，有时会出现互相矛盾的情况。例如，从这个经济效果指标看，甲种实践活动的经济效果比乙大，而从另一个经济效果指标看，甲种实践活动的经济效果比乙小。所以我们必须把各个经济效果指标综合起来进行研究。

在经济效果的概念中本来不出现价值的概念。在《经济效果与产品质量》一文中，我们已经讲清楚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效果的概念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效果的概念的一个根本区别是，前者的目的是生产使用价值；后者的目的是价值，准确地说是剩余价值。但是在社会主义生产中为了使各种不同质的使用价值量有一个综合的表现，为了使不同质的物化劳动的消耗有一个综合性的表现，就不得不利用价值这个范畴。所以经济效果的大小就常常要用以价值为基础的范畴来表现。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常用成本、利润、资金利用率、回收期等经济核算指标，来反映经济效果的大小。实行经济核算与讲求经济效果是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两件事情。经济核算指标它只能近似地但不可能准确地反映经济效果的大小。我们时常应用这些指标。因此有必要对有关这方面的概念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及区别研究清楚。

在《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质资料生产中的经济效果问题》当中，我说，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中，没有使用“经济效果”这一术语。有同志写信给我说，《反杜林论》当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资产者现在求助于暴力，以挽救日趋瓦解的‘经济情况’免于崩溃，可是他们这样做只是证明：他们陷入了杜林先生陷入的那条迷途，以为‘政治状况是经济情况的决定性的原因’，他们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样想入非非，以为用‘第一性的东西’、‘直接的政治暴力’就能改造那些‘第二等的事实’，即改造经济情况及其不可避免的发展，而用克虏伯炮和毛瑟枪就能把蒸汽机和由它发动的现代机器的经济效果，把世界

贸易以及现代银行和信用的发展的经济效果从世界上消除掉”。(《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1975 年版第 205 页。)因此表示对我的话怀疑。我认为这些同志之所以对这个问题产生怀疑，是因为他们误会了恩格斯这段话的原意。恩格斯这段话的原意是说，资产者现在求助于暴力，即求助于国家的干预等等，以挽救日趋瓦解的经济免于崩溃，是和杜林一样犯了把政治看成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原因的错误，以为用政治暴力(即恩格斯形象地说的“克虏伯炮和毛瑟枪”)就可以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的发展(即“蒸汽机和它发动的现代机器”“世界贸易以及现代银行和信用”等等)所必然造成的经济动荡和危机等后果消除掉，就可以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种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在这里，所谓蒸汽机等等的“经济效果”，就是指蒸汽机等等的应用和发展在经济上必然造成的后果来说的，它和我们所讲的“经济效果”根本不是一回事。

《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质资料生产中的经济效果问题》除了收入本书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外，成稿的本来还有第三篇和第四篇。第三篇写了提高物质资料生产经济效果的途径；第四篇写的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提高经济效果。

提高物质资料生产经济效果的途径，不外乎从减少劳动消耗和劳动占用或增加生产的产品两个方面来进行。而根本的是减少物质资料生产的活劳动消耗和物化劳动的消耗。

减少活劳动的消耗，途径之一是要充分利用劳动工时，最大限度地缩短劳动准备时间，减少以至消除工作时间内的劳